

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

宋 國 誠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四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本文旨在討論中共十七大確立的「科學發展觀」，其提出的背景與目的，內涵與特徵。作為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從體制轉軌型到高速增長型，再到科學發展型，其不僅改變了中國未來的發展圖景，其對中國未來情勢的影響也是廣泛而深遠的。

「科學發展觀」是在分析世界各國發展趨勢和總結中國改革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它標記出全面、協調、可持續、人本四個面向，四個面向旨在矯正片面、失調、高消耗、物化四個偏差傾向。今日中國已進入一個重要關口，究竟要走向穩定持續的發展，還是步向「拉美陷阱」？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究竟應把增長的成果繼續投入於發展經濟，繼續提高增長速度與增長率，還是轉而將部分財富用於健全社會福利與人文投資？這是一重大的選項與轉折。

本文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對馬克思人類發展第三（最高）階段的嚮往與追求。它在總體上涉及「思想觀念／經濟體制／政府模式」的轉型。它包括經濟增長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發展，包括人的主體從「經濟人」向「自由人」的發展以及人與自然關係上從消耗性發展到可持續性發展，也包括政治體制上從威權統治到公共治理、從統制型政府到參與服務型政府的發展。本文認為，「科學發展觀」是一種「人文／經濟／民主」的對接與融合，是跨越單純物質意義的經濟增長，走向人文意義的社會綜合發展，其最終目標則是實現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

關鍵詞：中共十七大、科學發展觀、社會轉型、巴黎手稿、人本、人類發展、公共服務、善治

* * *

* 作者在此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趙建民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涂豔國教授，於「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學術研討會」（台北，2007年12月14日）中，對本文提出寶貴的批評與建議，謹誌申謝。

壹、前言：科學發展觀提出的背景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2003 年 4 月 15 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廣東考察時指出，要堅持全面的發展觀。2003 年 7 月 28 日胡錦濤在「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更好地堅持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至於「科學發展觀」這一完整術語，則是胡錦濤於 2003 年 8 月 28 至 9 月 1 日在江西考察時提出的，當時他提到：「要牢記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積極探討符合實際的發展新路子，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①。2003 年 11 月 21 日，中共總理溫家寶總理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採訪時指出，「我們新一屆領導通過抗擊非典型肺炎這場疾病，得到一個重要的啓示，就是要注意協調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就如同一個人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一樣，一定會跌跤的。一個國家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也會跌跤的」^②。

直到最近，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1 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七大」）中，提出了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觀點，這個理論體系除了繼承鄧小平理論，重申「三個代表」理論之外，還把在「十六大」三中全會中首次提出的「科學發展觀」^③，列爲此一理論體系的構成要素，並將之定義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胡錦濤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爲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胡錦濤還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視爲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目標，把「科學發展觀」視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在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框架下，「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衆化」^④。除此之外，「科學發展觀」在這次「十七大」中正式寫入黨章。「十七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中指出，要「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方面」，藉此再次申明了科學發展觀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指導意義^⑤。

註① 胡錦濤，「發揚井岡山精神 全面建設小康」，新華網，2003 年 9 月 2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2003/Sep/396482.htm>。

註② 「溫家寶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唐尼採訪」，新華網，2003 年 11 月 24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4/content_1193947_2.htm。

註③ 「科學發展觀」是胡錦濤於 2003 年 8 月 28 至 9 月 1 日在江西考察時提出，當時他提到：「要牢記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積極探討符合實際的發展新路子，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註④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人民網，2007 年 10 月 15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05264/105268/6379572.html>。

註⑤ 張天蔚，「從若干『新提法』展望中國的未來」，人民網，2007 年 10 月 22 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GB/6411726.html>。

綜觀胡錦濤的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正案，可以歸結今後中國大陸的治國理念和發展戰略為如下的論述：「運用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方法，建立以人為本、社會和諧的小康社會」。

然而，中國雖然可以將「科學發展觀」視為中國社會轉型的規劃藍圖，乃至於以「最高政令」加以宣導和推廣，但本文無意配合宣導或隨之起舞。從「全球治理」而言，科學發展觀雖是中國官方所提出，但並非中國專屬的意識形態，無論就科學發展觀的內涵與性質，或其在實踐上的矛盾與困難，皆應視為當代人類共同涉及的發展議題，也就是「全球發展」問題；另一方面，就中國內部而言，科學發展觀尚且停留在理想期待和紙上規劃之上，其與中國現實情況的落差與乖離，應得到學術上的重視與闡釋。

中國國情專家胡鞍鋼把「科學發展觀」稱為「中國第二代發展戰略」，是中國「面臨重大政治、經濟、社會挑戰的積極響應或主動回應」^⑥。然而，何謂「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現實的國情與現狀來說，「科學發展觀」是基於什麼需求和追求什麼目標而被提出來的？就全球化趨勢和國內環境而言，科學發展觀具備哪些路徑選擇和制度創新資源？對於這些問題，各方的看法是多元的、廣泛的，歸納起來，可以在始末的意義上——從「危機治理」的需求以及「全社會目標」的聯繫上來討論。

就目標選擇來說，科學發展觀的目標是為了跨越單純追求高速增長的物化經濟，朝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綜合的發展，其最終目標在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張學森指出，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為了鞏固和提高目前達到的小康水平尋找新的發展動力和機制，旨在解決「跨越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問題，其對中國未來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⑦。

1990 年代末期，已有人提出關於中國採取「漸進式—增量改革」的制度資源與社會支持已逐漸出現枯竭與式微的觀點，認為中國初始改革的策略：「高耗低效」的戰略，已出現動能衰竭的危機。換言之，改革的負效應—帕累多最優的遞減效應—已經明顯浮現。Lieberthal 和 Lampton 在 1990 年代初期就已提出「國家碎片化」（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的觀點^⑧，來形容一種「制度—耗損式」改革負效應；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則以「斷裂／失衡」來總結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現實^⑨；周雪光以「逆預算軟約束」（inverted soft constraint）來分析中國地方治理的偏差與失誤^⑩；而

註⑥ 胡鞍鋼，中國：新發展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7。

註⑦ 張學森，「科學發展觀：背景、內涵及創新點」，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學報（成都），第 2 期（2004 年），頁 25~26。

註⑧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註⑨ 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孫立平，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註⑩ 周雪光，「『逆向軟預算約束』：一個政府行為的組織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北京），第 2 期（2005 年），頁 132~207。

近期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為了解決瀕臨失控的「三農問題」^⑪；除此之外，更有人提出「中國崩潰論」^⑫，對中國未來情勢提出悲觀的預言。以上種種，基於對中國整體危機的嚴肅認知與鄭重回應，基於必須分享改革效益並提供深化改革的社會動能，也基於實現兼具公平與效率的社會環境，一種建立在既能確保現有改革成效又同時能夠有效治理和解決整體危機的新發展戰略，便自覺地被提出、討論和推動了起來。

從危機認知與回應來說，2003 年 4 月突然爆發的 SARS，給予中國政府極大的震撼和警惕^⑬。SARS 疫情失控式的蔓延以及政府危機處理的蒼惶失措，暴露了中國社會體制的脆弱體質，反映出城鄉、地區、階層之間的巨大差距，形成了與西方「M 型社會（中產塌陷）」相類似的「U 形社會（底層膨脹）」^⑭。除此之外，中國「入世」之後以及全球化競爭的壓力，中國公民對政治參與和組織自治的要求，社會各界對分配正義和縮減貧富差異的需求，綠色人士與國內外生態保護運動對中國生態惡化與資源耗損的關切與施壓，農民與工人的相對剝奪與社會失望感，以及政府自身自覺的職能改革等等，這些嚴峻的社會現實，都對中共的執政能力形成挑戰，使中共當局興起執政的危機感。

就執政危機來說，中國大陸一般人民已有人提出，共產黨打的天下難道一直是共產黨嗎？儘管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已經在憲法中得到了確認，但這並不等於說黨就可以高枕無憂，如何保持黨的執政地位，始終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戰略性課題^⑮。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了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執掌好政權尤其是長期執掌好政權更不容易。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⑯，顯示中共對自身執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與執政能力的下降，已有警覺。這裏所謂「合法性」，不僅是指執政黨從國家和社會中所獲得的支持程度，而且體現為執政黨領導與執政本身的領導的合理性、權力的合法性和治理的有效性^⑰。這說明中共即使取得了「形式合法性」，也還尚未鞏固「實質合法性」。除此之外，近年來，中共執政競爭力問題也多次被提及，其中包括黨員執政意識不強、部分黨員的先進性弱化，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幹部不敢也不願堅持真理和捍衛真理、以短期利益犧牲長期戰略利益，以及利益集團的腐敗導致執政資源的流失等等^⑱。

註⑪ 馬曉河等，「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若干問題的研究（主報告）」，*經濟研究參考*（北京），第 50 期（2006 年），頁 2~27。

註⑫ Gordon G. Chang（章家敦），*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London：Arrow, 2002）。

註⑬ 陳德昇，*兩岸危機管理：SARS 的經驗教訓與比較*（台北：晶典文化，2005 年）。

註⑭ 孟軻、王玉福，「試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危機意識」，*唯實*（南京），第 7 期（2005 年），頁 11。

註⑮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4。

註⑯ 常素梅，「重塑合法性基礎——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建設面臨問題的思考」，*常熟高專學報*（常熟），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4。

註⑰ 黃明哲，「關於提升中國共產黨執政競爭力思考」，*理論前沿*（北京），第 15 期（2005 年），頁 16~18。

過去中共以「依法執政」作為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但面對未來執政環境的複雜化，消極的依法執政已不能應付日益多變的政治生態。在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同時，中共也提出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口號，顯示未來中共的執政方格將被迫傾向公民利益與基層治理，藉以擴大執政的社會認同與公民參與。

貳、第三次社會轉型：人文、經濟與民主的融合

如果「科學發展觀」不是「新」的發展觀，中國領導人自然無需既將之視為「理論體系」的重要構成要素，也不可能將之列為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於是，如何理解「新發展觀」的內涵與特徵？「新發展觀」將如何影響中國未來整體發展的思路與構局？如何影響中共的執政理念和政策執行？這是探討「新發展觀」幾個重要面向。

「發展」與「轉型」的關係至為密切。Joseph E. Stiglitz 指出，「發展的基本特徵就是它代表了一種社會轉型，特別是發展包括了從傳統關係、傳統文化、社會習俗、傳統醫療與教育方式及傳統生產方式向更現代方式的轉變」^⑱，因此，「一個發展戰略首先需要闡述轉型的概念」^⑲。換言之，即使就全球發展來說，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調整問題，更是社會轉型的問題。社會轉型需要用一個整體的和協調的方法來重建社會和經濟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和方法。

「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是社會學家借自生物學對“transformation”概念的運用。在生物學中，「轉型」是指物種間的變異，即微生物細胞之間以裸露的去氧核糖核酸的形式轉移遺傳物質的過程。西方社會學家借用此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具有進化意義的轉換和質變，藉以說明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範型(modernization paradigm) 社會結構的轉換^⑳。準此而論，「轉型」含有變異與進化的雙重涵意，具有汰舊換新、去劣擇優、由簡到繁的涵意。

但與「生物轉型」不同的「社會轉型」，並不是一種漫無目標的變異，而是一種集體意識下、自覺性選擇和價值性追求的過程，在理想的狀態下，它是期待走向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綜合多元的整體性價值（當然也可能發生失敗的轉型）。就以科學發展觀為戰略目標的中國社轉型來說，中國學者李鋼指出：「社會轉型本質上應當是以人為價值出發點和核心的多種價值目標共同發展的過程；它應當始終包含對個人和社會發展的終極關懷，應當把以實現人的各種需要為目的的全面自由發展和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視為其為根本價值」^㉑。

註⑱ 王燕燕編譯，Joseph E. Stiglitz 著，「走向一種新的發展範式」，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第 1 期（2005 年），頁 1。

註⑲ 同前註，頁 4。

註⑳ 參見李培林，另一隻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第 2 章；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北京），第 1 期（1997 年），頁 18；王雅林，「社會轉型理論的再構與創新發展」，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 2 期（2000 年），頁 168~173。

註㉑ 李鋼，「論社會轉型的本質與意義」，求實（南昌），（2001 年 1 月），頁 55~57。

在轉型的時間界定上，筆者把中共建政（1949）以來的社會轉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延襲蘇聯經驗、採取重工業化超趕戰略、實行人民公社和國有化的計劃經濟體制（1949—1978）；第二階段是依據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點，實行以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2006）；第三階段是以「胡溫體制」為主導，實行「統籌協調、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體制（2006—今）。這裏所謂「第三次轉型」就是指以「科學發展觀」為轉型主軸和發展範式（paradigm of development）的新社會轉型。

既然謂之「新」的發展觀，必然是對「舊」的發展觀的修正、改革、轉向或取代；既是謂之關於發展的「新觀念」，必然就是對「舊觀念」的批評和導正；兩者合而觀之，「科學發展觀」必然涉及從傳統發展觀向新發展觀的轉型和過渡，並牽動包括思想路線、政經制度、社會文化整體改革的路徑與方向。

「科學發展觀」是在分析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趨勢和對改革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標記出「全面」、「協調」、「可持續」、「人本」四個面向，由此可以看出，四個面向旨在矯正「片面」、「失調」、「高消耗」、「物化」四個偏差傾向。另外，就「可持續發展」來說，除了社會發展形態的新舊交替之外，從世界思潮的範圍來看，特別是一方面試圖避免「拉美陷阱」，又想跳出「西方現代化」的發展偏向而言，科學發展觀似乎又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相互交叉的複生物。

後現代發展觀是一種強調整體、和諧的「新世界意識觀」，力圖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重構人類失去的宇宙之根、地球之根、自然之根以及人類謀求和諧發展的生命之根，從而使人類擺脫當今世界的暴力、貧窮、生態惡化、壓迫和非正義的境況^②。

人們目前熟知的「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一名詞，其前身稱為「穩態經濟」（steady-state economics），這是由戴利（Herman Daly）提出的。戴利將「穩態經濟」（SSE）定義為：「一種使人口與人工製品通過低比率之維繫流量（low rates of maintenance “throughput”）以滿足一定水平之欲望與滿足的經濟系統」。這裏所謂「流量」是一個內涵熱力學定律與「熵」（entropy）概念的物理學概念，它概括「從初始的生產（從環境中汲取低熵進行耗損）到消費階段（排出高熵性廢料與異物之環境污染）」的整個流程^③。戴利還提出了「零增長」的概念，這在新古典經濟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是駭人聽聞的。實際上，零增長（zero growth）並不是「無發展」。「穩態經濟」不是追求數量的增加而是質量的改進，而是不再通過消耗性的增長來實現穩定均衡的發展。「零增長」往往給人一種誤解，以為社會的演進陷入停格狀態，實際上，穩態經濟並不是指「流量」的恆定，而是指流量本身必須在生態承載

註② 王建新，「論後現代主義視域中的發展觀」，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新鄉），第 32 卷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35—38。

註③ Herman Daly, *Steady-State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with New Essay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1), p. 17.

的能力之內；零增長也不是指欲望中止或技術停滯，它實際上是通過改善新陳代謝系統而建立的「地球護理學」。

倫理增進高於經濟增長，這是後現代發展觀與科學發展觀的相通之處。後現代主義提了「有限增長」的觀念，它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為了給未來幾代人更多的機會，必須限制以地理和生態資源的消耗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欲望；二是人類經濟活動侵奪了其他物種的生息繁衍地；從而造成了有感覺的次人類物種數量上的銳減甚至滅絕；三是累計增長會自行抵消個人福利；四是經濟的增長對於道德資本亦即促進增長的態度具有腐蝕效應，譬如它鼓吹自私自利和技術統治主義—還原主義世界觀，因而增長的欲望應當受到限制^④。

中國從 2003 年開始進入了人均 GDP 超過 1000 美元的中低收入 / 中等發展國家。多數經濟學家已經察覺，中國已進入一個「重要關口」，亦即究竟走向穩定持續的發展？還是走向國際經濟上所謂「拉美陷阱」？於是對中國政府而言，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究竟應把增長的成果繼續投入於發展經濟，繼續提高增長速度與增長率，還是轉而將部分財富用於健全社會福利與人文投資，這是一項困難的選擇，但顯然是無可必避免的選擇。

「科學發展觀」並不是對市場經濟的單純否定，也不是向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回返，而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社會結構與人文素質的調適與轉化，這個「轉化範式」（paradigm of transformation）是指向「人本性」（People Oriented）和「可持續性」（substantiality）。以哲學面來說，它是向青年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全面發展」的呼應與回返；以政治面來說，它是政府職能由威權統治向公共治理和社會服務的轉向，亦即從新權威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轉變^⑤；以經濟面來說，則是以「人本經濟」為目標模式。

進一步言之，經過近 30 年市場經濟「摸石過河」的試驗，無論在宏觀或微觀，市場經濟「利弊互見」的情況已經十分明顯；為了確保長遠、可持續、穩定的發展，在經歷由計劃到市場的第二次社會轉型之後，有必要進行第三次社會轉型，並盡可能面對並克服發展至今所形成的偏差、失誤與瓶頸。從總體內涵而言，「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涉及了思想觀念、經濟體制、政府模式三個主軸的轉型，因而是一種「總體性發展」的轉型，它既包括經濟增長在內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會保障、醫療保健、社會秩序等方面在內的發展，也包括人的發展在內的人性尊嚴、價值、潛力、素質等方面，從「經濟人」向「自由人」的發展，也包括從人與自然環境關係上從消耗性發展到可持續性發展、從「物役」的發展到「養生」的發展；也包括政治上從威權統治到公共治理，從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到市場經濟的「有限責任政府」、從「審批型政府」到「監管型政府」，亦即變「人治型政府」為「法制責

註④ 沙宏，「論後現代主義發展觀」，社會科學輯刊（瀋陽），第 3 期（2006 年），頁 49。

註⑤ 徐勇，「從新權威主義到新民主主義—中國改革發展的路向及轉變」，決策諮詢（合肥），第 9 期（2003 年），頁 38-39。

任政府」的發展。在此意義上，標誌著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的「科學發展觀」，是一種「人文／經濟／民主」的對接與融合，是跨越單純物質意義的經濟增長，走向人文意義的社會綜合發展，最終目標則是朝向全面小康邁進。

馬克思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將人類社會發展依據其所對應的生產形式分為三個階段，並將「人的自主性」視為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指出：「人的依賴性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次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⑥。在這裏，馬克思依據人在社會生產關係中人自身發展的程度——從對自然的依賴到對物的依賴，再到擺脫了一切外部依賴並獲得自主之主體性，來界定「人的全面發展」的屬性，並將之視為發展的終極目標與最高境界。

叁、思想觀念的轉型

一、對「以人為本」的闡釋

胡錦濤曾在多次場合以「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來闡釋「三個代表」的思想^⑦，並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及「心裏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作為中共幹部思想與行動的準則^⑧。由此可以看出，所謂「以人為本」中的「人」，是指一般意義的「人民」、「群眾」、「百姓」，是執政黨在立法、決策和與執行等公共事務中為之服務的對象，以西方的觀點言之，是指「公民」（citizen），而不是「個人」（individual）。換言之，「以人為本」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延伸和具體化，這裏所謂「人」，意指「最廣大的人民」。

目前中國對「以人為本」的英文譯法，至少超過 40 種以上，但從中共官方所發佈的文件或領導人正式談話中，「以人為本」具有幾近官式化的定義。陳雲芝依據中國權威期刊 *Beijing Review* 並作內容分類，指出在領導層中主要使用“put people first”和“people-oriented”兩種形式。例如外交部長李肇星就中國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Foreign Minister on Development Work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將「以人

註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頁 104。

註⑦ 胡錦濤，「領導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中新網，2008 年 3 月 31 日瀏覽，<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2-18/26/273898.html>。

註⑧ 胡錦濤，「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中新網，2008 年 3 月 31 日瀏覽，http://news.yninfo.com/china/gsyw/200710/t20071009_484378.htm。

為本」譯為“put people first”；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人為本」則譯為“putting people first”；胡錦濤 2004 年出席「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以「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為題發表演講，其中「以人為本」被譯為“people-oriented”；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以人為本」被譯為“human-oriented”^②。儘管英文譯法有些差異，但皆使用“People”，以區別於西方社會所慣用的“Human”一詞。

然而，將 People 與 Human 刻意作出區分，顯然是基於不願與傳統上遭到貶抑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混為一談，但實際上，以 People 取代 Human 不僅降低的科學發展觀在「人的發展」價值的廣延性與普世性，這種刻意的前提首先是混淆了「人文主義」（Human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差異。People 通常是作為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施行的對象而言，其中必然難以迴避種族、區域、城鄉、階層、文化的區別，Human 則是指無差異、一視同仁（人）的所有人，它較能體現公正性與平衡性。準此而論，「以人為本」最恰當的表述方式應是“Human Oriented”或“Human Centered”。

二、人的全面發展：重返「馬克思人學」

「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的全面發展，是對傳統社會主義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靈魂深處鬧革命」之革命文化的撥亂反正。所謂「革命文化」是指把作為主體的人倒轉為社會革命與權力鬥爭的工具，是一種「非人化的工具論」。在中國第一次社會轉型中，傳統文化被「革命文化」徹底破壞，傳統中國人（仁）學思想被徹底拔除。整個社會文化被整合進政治意識形態結構，失去獨立的地位，意識形態鬥爭充當了文化演進的原動力，在社會革命的方法論上，搞爆破、搞砸爛、搞大批判，用罵倒一切的方法推出新文化新觀念；整個人化形態呈現高度剛性，不允許任何不同的文化形態共存。其結果是，「『革命文化』的暴力性從深層上遮蔽了自由自覺文化意識的發生與發展，不僅造成從1958年至1978年整整20年間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停滯不前，而且最終通過『文化大革命』而『大革文化命』，極大地破壞了文化的建設與發展」^③。儘管進入第二次社會轉型期，有所謂「文化熱」和「主體性」的討論，但終究沒有把「人」擺到本體論的地位上。人的沉淪與萎縮，文化的粗糙和劣質化，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是一種「中國病」，一種歷經多次社會轉型但卻沒有被充分認識和把握的深刻病蠱。「如果對中國改革的問題進行認真診斷，就會發現中國的主要病症往往不是經濟病，而是政治病和社會文化病」^④。

「以人為本」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手段，反過來說，「人的全面發展」則

註② 陳雲芝，「論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6年），頁52-55。

註③ 陳一放，「論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社會科學研究（北京），第3期（1998年），頁42-43。

註④ 單少杰，「中國改革的整體性視角－從一種『新發展觀』談起」，哲學研究（北京），第11期（1994年），頁3-11。

是「以人爲本」的終極目標。依據上述，「以人爲本」的「人」並不是西方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個人」，而是指「人民」與「大眾」，也就是個人與社會統一的「全民」和可持續發展意義上的「人類」。從哲學與文化思想上來說，馬克思的名言：「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合」，這一命題可以視爲「科學發展觀」在「人的全面發展」這一面向總的提示與概括。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科學發展觀所提出的「人的全面發展」，是指人的社會存在或人的社會性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全面」(all-around)在這裏是指作爲個體的「類意識」與作爲集體的「類存在」相互的確認與實現^②。另一方面，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協調發展」，除了區域經濟與城鄉發展的協調之外，就人的全面發展的協調性而言，是指個人的生產和活動以共同活動和共同享受的方式體現出社會生活的普遍性和規律性，亦即一方面個人活動體現社會集體利益，一方面社會生活也體現個體特殊的「類生活」與「類活動」。綜合來說，人的全面發展不僅是「類意識」與「類存在」的統一，也是「類生活」與「類活動」的統一。

「人的全面發展」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也不是人的欲望、需求與利益無限制、最大化的滿足而已，而是人通過社會勞動既實現了人自身的智性與潛能，又實現了社會共同利益，進而實現人對社會勞動成果的享受與占有。馬克思在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改寫了費爾巴哈 (Ludwig A. Feuerbach, 1804—1872) 基於人的天然生理屬性所進行之直接聯繫所形成「自然共同性」，一種僅僅滿足基本需求的原始的結合或聯合，而是從人的有目的的社會勞動 (自由與自覺的勞動) 來解釋人對自身本質的實現。因此，馬克思的「類意識」不只是「人的意識」，而是「個體意識」與「社會意識」的整合，是人不斷在社會勞動中獲得充實和發展的過程。因此，「這種類意識就不再只是人的感性活動的直接滿足和延續，不是人單純消費自然物質所獲得的填飽，而是把人自身全部的社會活動納入自己的有系統的知識框架和歷史評價，並在意識中加以理論化、概念化，從而採取一定的抉擇和歷史行動的『普遍化意識』」^③。這種「普遍化意識」是指人對於自身作爲自覺的、自由的「社會成員」(social membership) 的體認，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展現，「亦即他的能力、才能、感覺以及自己和周圍世界的一切關係之全部豐富性的實現」^④。

肆、經濟體制的轉型

一、重新定義市場經濟——所謂「市場不等式」

如果依據鄧小平以人均 GDP 達到 800 元來定義「小康」，中國已在 2000 年達到

註② 宋國誠，馬克思的人文主義：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新探（台北：桂冠出版社，1990），頁 236。

註③ 宋國誠，前引書，頁 236。

註④ 宋國誠，前引書，頁 237。

這一水平。2003 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人均 GDP 超過 1000 美元的中低收入 / 下中等發展國家之列^⑤。儘管有學者認為中國還只是處於「初級小康」的局面^⑥，但多數經濟學家已經察覺，中國在經歷了非協調、無比例的工業化超趕式發展之後，已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和發展停滯。為了警惕此一陷阱，已有不少經濟學家一方面提出整頓市場倫理，另一方面提出反思市場機制—扭轉「市場崇拜」、重新定義市場作用—防止「市場泛化」—的觀點。

中國大陸歷經近 30 年的市場經濟，其成敗至今還難以定論，但從一方面是大量反市場行為存在^⑦，另一方面又是市場膨脹交互並存來看，中國的市場經濟還處於「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說，政治領域和眾多的公共領域是無法完全引入市場機制的，而這些領域卻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所必需的，這就是所謂「市長不等式」的第一個涵意。儘管有人並不同意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的「國家悖論—諾思第二悖論」觀點^⑧，但中國政府一方面需要鼓勵市場機制以優化資源配置，一方面又需用運用「超市場」的官僚權力或多元化產權形式以扭轉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這種因為「市場殘缺」而使國家權力「常態性泛化」的現象，則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一方面既承受市場的殘缺性和不均衡性，但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市場經濟一抓就靈」的思想以及「唯市場主義」的傾向，這是「市場不等式」的第二個涵意。有學者把這種「市場崇拜」看成是科學發展觀的思想障礙。在一種「市場神話」之下，人們往往只看到市場可以帶來效率，但忽視市場會加劇地區發展的失衡與差距；在市場原則的泛化之下，導致人們不分青紅皂白的將市場原則帶入非經濟領域，造成「金錢萬能」、「貨幣上帝」的偏差局面^⑨。

除了一般人們熟知的「市場失靈」，包括市場低效與市場無效之外^⑩，對中國特殊國情而言，還存在「市場倫理」的問題。當前中國市場混亂現象普遍存在，它主要表現出低水平的無序競爭和企業詐欺行為普遍化，以及行政性壟斷侵入市場，權錢交易和腐敗行為導致市場失靈，資源配置效率下降^⑪。基於市場無序化以及人們對市場倫理的質疑，必然帶來對「分配公正」的不滿，引發「誰才應該是市場經濟受益者？」的

註⑤ 「外媒稱十七大報告是一份涵蓋廣泛議題的報告」，中國網，2008 年 3 月 31 日瀏覽，http://big5.china.com.cn/17da/2007-10/16/content_9067919.htm。

註⑥ 王煊，「詮釋 GDP 與中國全面小康」，武漢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武漢），第 16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76。

註⑦ 何清漣，「中國經濟的反市場形態原因分析」，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5 期（1990 年），頁 53~59；孟秋菊，「我國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倫理建設探析」，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2 年），頁 12~16。

註⑧ 伍裝，中國經濟轉型分析導論（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9。

註⑨ 徐俊忠，「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走出『市場崇拜』的誤區」，現代哲學（廣州），第 1 期（2007 年），頁 10~12。

註⑩ 付子順，「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失效原因分析」，科技諮詢導報（北京），第 3 期（2007 年），頁 162~163。

註⑪ 朱婭，「論經濟倫理與市場秩序」，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頁 53。

爭論。有人對中國高收入階層的調查顯示，許多高收入者非但不是依靠社會貢獻贏得報酬，反而是依賴各種因為「市場缺陷」所導致的「爆發（暴富）機遇」，諸如價格雙軌、利率差價、房地產批租、炒股發財等等，但對中國各階層來說，這些「機遇」絕非是平等的^②，因為這裏所謂「機遇」，實際上是市場帶來的「不公平機會」，這意味人們相信通過市場來實現商品公正分配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因為「市場本身不會解決一些重要的社會任務，例如保障就業、穩定貨幣、實現社會和解以及保護環境等等；忽視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一味地把市場的作用神化，以至於用其否定其他手段對於經濟的作用，只能是不斷地弱化乃至損害社會和諧的現實基礎」^③。

二、重新定義「經濟增長」

（一）增長不等於發展

對於胡錦濤在「十七大」提出「科學發展觀」，國際間的反應多趨於正面。日本「時事社」2007 年 10 月 15 日發表評論，指出「十七大」將改變中國經濟政策上「經濟至上」的方針^④。「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客觀上要求對「以物為本」的傳統發展觀和經濟增長論作出反思與批判。

早在 1960 年代末期，英國經濟學家 Dudley Seers 就指出不能輕率將發展等同於經濟增長的觀點。Seers 指出，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社會危機和政治動亂不僅折磨了經濟停滯的國家，也折磨了人均收入迅速增長的國家。「似乎經濟增長不僅不能解決社會和政治上的困難，而且某些類型的增長實際上會引起這些困難」^⑤。

對中國經濟現實相當熟悉、前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指出，儘管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成功，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從改革初期的快速增長中受益。中國社會不平等的情況有所加劇，過度依賴於市場力量，使某些農村地區醫療、教育和生活水平降低。經濟的快速增長也給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人們發現這種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的增長從長遠來看是不可能持續的。中國過去所走的道路已經無法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Stiglitz 強調，中國需要調整方向^⑥，「中國需要看輕 GDP，更多地關注其他衡量標準」^⑦。

換言之，一個國家即使人均收入已經大幅提高，但在國家經濟中如果沒有包含減少貧困、失業和不平等現象諸目標的「計劃」，就不能被認為是「發展計劃」。Seers 強調，以經濟增長來概括「發展」是不夠的，「一個國家除非在經濟增長之外在不平

註② 遲福林，「論『公共服務型政府』」，理論參考（福州），第 6 期（2006 年），頁 26~27。

註③ 徐俊忠，前引文，頁 11。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年），頁 47、50。

註⑥ 譯者不詳，Joseph E. Stiglitz 著，「新發展模式」，中國發展觀察（北京），第 4 期（2007 年），頁 56。

註⑦ 譯者不詳，Joseph E. Stiglitz 著，「中國已經趟過河流」，價格理論與實踐（北京），第 7 期（2007 年），頁 70。

等、失業、貧困方面趨於減少，否則不可能享有發展」^④。換言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將告別西方社會那種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以實現財富的增長為目的的經濟發展觀。

（二）告別 GDP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美國就有學者從經濟福利的角度認識到有關傳統總量核算指標的不足，進而提出了「經濟福利尺度」概念，並主張以其代替 GDP。後來，又進一步提出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Green GDP”的概念。世界銀行 20 世紀 80 年代初具體標列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框架和指標，並逐步成為衡量現代發展進程、替代傳統宏觀核算指標的首選指標。

1980 年代初期，「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受到了重視。1983 年，時任挪威首相及世界衛生組織主席布郎德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中提出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簡稱「布郎德報告」（Brundtland Report）的發言，該報告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舉凡資源開發、投資取向、技術與制度的改革，彼此之間均能取得協調一致，因而促使其滿足人類需要的現有及未來之潛能，獲得加強」^⑤。

到了 1990 年代，特別是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發展」的概念更加趨向廣延化和普世化。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1990 年首次提出「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這一概念。該機構從 1990 年起，每年發表一份不同主題的《人類發展報告》，對世界各國的人類發展狀況進行評估和比較。這個機構與年度報告，著重於人類自身的發展，認為增長只是手段，而人類發展才是目的，一切應以人為中心，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

從「綠色 GDP」到「可持續發展」，再到「人類發展」，說明了 GDP 的增長並不於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並不等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也不等於人類發展，因為人均 GDP 指標的概念常常掩蓋了居民貧富差距懸殊、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另一方面，增長不是發展的目的而是手段，發展的真正涵意是人類發展，即以人為本的發展。這一關於增長與發展的「手段／目的」論，以及經濟增長與人類發展的「因果不等式」，已經獲得多數人的理解與贊同。進一步來說，即使有效率的增長也未必導致公正合理的人類發展。胡鞍鋼將增長區分為「公平／不公平」、「低（無）通膨／高通膨」、「充分就業／高失業」、「可持續／不可持續」四種不同的方式與結果。這其中，「不公平的、高通膨的、高失業的、不可持續的非均衡增長不僅不具有可維持性，也不值得維持」^⑥。在此意義上，科學發展觀旨在突破建立在「GNP／

註④ 羅榮渠主編，前引書，頁 68。

註⑤ 黃馨慧譯，賽吉·高德里耶主編，*全球新趨勢*（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26。

註⑥ 胡鞍鋼，前引書，頁 44。

GDP 幻覺」之上的傳統發展觀中，突破用單一 GDP 來衡量發展的觀念，而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維指標來衡量發展的結果^⑤。

實際上，以 GDP 為衡量基準的經濟增長，並非總是帶來好的結果，許多情況下的增長甚至是「惡的增長」。Marshall Sahlins 對石器時代採集狩獵部落的經濟生活作出大量研究後表明，那些沒有多少財產的原始人事實上並不窮困，他們擁有更廣闊的活動空間、更充足的陽光、更新鮮的空氣、更多的休閒時間和更多隨手可得的食物，若以此觀之，所謂的經濟發展只不過是「現代人」的一種幻覺而已。因此，「『經濟』與其說是一種行動或者理性的範疇，毋寧說是一種文化的、政治的或宗教的範疇」^⑥。János Kornai 也指出：「僅僅依賴經濟增長來解決轉型問題是危險的。……政治改革、法律改革等等都是轉型的重要方面」^⑦。Kornai 在 1972 年的急進與和諧增長（*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一書中，對史達林式的「增長狂熱症」（growth mania）提出批判，並認為轉型應該是綜合與全面的，任何片面強調增長狂熱和數字神話的傾向，都是不合理的。在此意義上，例如沒有能夠創造就業機會的增長可以稱為「無效增長」，不能提供更多人的增長可以稱為「少數增長」；不能伴隨公民更多公共參與的增長可以稱為「無聲增長」，不能提高人的素質和文化水平的增長可以稱為「暴發戶增長」，最後是付出資源和生態巨大代價的增長可以稱為「得不償失」的增長。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牛文元，是近年來建立「中國綠色 GDP」主要的鼓吹者。他指出，使用傳統的 GDP 核算制度往往掩蓋了經濟增長中「惡的產出」。傳統 GDP 的缺陷在於：「從社會角度看，GDP 將質量好的和壞的產出，一視同仁算在國民財富之中；從環境角度看，它認為資源和生態環境是自由財富，不去考慮資源的稀缺性與生態的退化；從經濟角度看，它只記錄看得見的、可以價格化的勞務，其他對社會非常有貢獻的勞務卻被摒除在外」。牛文元指出，1985—2000 年的 15 年之間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GDP 年均增長率為 8.7%，但如果扣除損失成本和生態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虛數和人文部分的虛數後，這一期間中國的「真實國民財富」僅為名義財富的 78.2%，這意味著這 15 年中國 GDP 的實際年均增長率只有 6.5%^⑧。

Joseph Stiglitz 也提出忠告，他指出，當中國評估它的成就時，也需要使用可以反映其寬廣視角的度量標準，這首先包括「綠色淨國民產出」（green net national product）一即便這個標準不能完美地度量對環境的破壞，但試圖去度量也總比忽略要好；其次是中國應追求中位收入，而非平均收入；第三是不平等的度量，如基尼係數

註⑤ 白永秀、任保平，「從傳統發展觀到科學發展觀：發展觀的創新」，*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第 8 期（2004 年），頁 5；張良、戴揚，「經濟轉型理論研究綜述」，*開放導報*（深圳），第 6 期（2006 年），頁 93-96。

註⑥ 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ress, 1972), p. 37.

註⑦ 吳敬璉主編，János Kornai 著，「大轉型」，比較，第 17 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年），頁 11。

註⑧ 牛文元，「可持續發展：21 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北京），2003 年 11 月 27 日，*新浪網*，<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3-11-27/1723261360.shtml>。

(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 0.47)；第四是社會性指標，如預期壽命和教育方面的指標，以及這些指標的分佈情況^⑤。

在確立科學發展觀之後，中國將告別傳統意義的 GDP 概念。中國已故的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曾慶紅，2004 年 2 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中指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同保持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是內在統一的，GDP 是世界通用的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在我國整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保持 GDP 的增長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作為綜合經濟考核指標，GDP 也有著不容忽視的缺陷；我們一定要用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的思想方法去對待現有的 GDP 核算制度，防止任何片面性、絕對化」^⑥。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十七大」召開期間也表示，科學發展觀絕不僅僅是單純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踐行科學發展觀要義之一是推進建設生態文明^⑦。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將不再把 GDP 作為測定發展的唯一指標，而是要將環境、資源、社會進步等等包括進來。

（三）質疑「高速論」與「先富論」

隨著新發展觀的提出，當初作為啟動經濟改革之初始誘發機制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點，以及經歷 20 幾年經濟成長率達到平均兩位數字的高速增長策略，也受到了反思和質疑：人們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了以 GDP 增長為中心，把「發展是硬道理」變成了「增長是硬道理」。有學者指出了長期存在的「假發展觀」，亦即認為高增長速度就是發展，認為大搞建設就是發展，認為快速致富就是發展，以致導致了不計代價的發展和政府違背市場包辦發展^⑧。這種「假發展觀」來自於對人類發展尺度的單一化理解，它誤導社會發展並將之帶向了人的發展的反面^⑨。

在改革開放初期，「先富論」雖然是在國民經濟基礎薄弱時具有拉動與示範效果，但一旦經濟步上增長軌道，對於長期被忽視的「後窮」者而言，相對剝奪感自然格外強烈而凸顯。199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最快速的莫過於城市房地產業，粗略估計，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對 GDP 的貢獻可以上達 30%—40%。實際上，人們不僅以「泡沫經濟」來形容過熱的房地產，在高速增長的背後往往是令人瞠目結舌的犯罪活動。胡鞍鋼指出，「高速增長本身既是一個極不平衡的過程，也是極不穩定的過程」^⑩，因為高速增長必然引發增長快慢、所得高低、貧富差距之間對效率與公平的兩極化爭論。胡鞍鋼特別強調高速發展引發「大規模人口流動」和「大規模破壞生態」所導

註⑤ 黃孝如譯，Joseph E. Stiglitz 著，世界的另一種可能（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7），頁 188。

註⑥ 「省部級主要領導進京研習新發展觀，曾慶紅講話」，新華網，2008 年 3 月 31 日瀏覽，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2/16/content_1316685.htm。

註⑦ 潘岳，「踐行科學發展觀要義之一是推進建設生態文明」，新華網，2008 年 3 月 31 日瀏覽，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5/content_6886498.htm。

註⑧ 盧映川，「論新發展觀」，首都經濟（北京），（2002 年 12 月），頁 18~21。

註⑨ 陳向義，「傳統發展觀的前提批判」，社會科學（上海），第 4 期（2003 年），頁 87~90。

註⑩ 胡鞍鋼，前引書，頁 81。

致的對社會安定的巨大衝擊。

這種在經濟指標上追求高速、急成、達標的「唯增長主義」—「短平快」式經濟增長模式—不僅造成中央宏觀調控上忽緊忽鬆、忽冷忽熱的惡性循環，也造成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實際上，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地方政府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中，「GDP 指標」不僅是一個主要的惡源與禍根，而且還構成了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最大障礙。因為「GDP 這個長期被人們用來衡量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已越來越顯單薄，其內涵無法反映出對就業的拉動、對公眾帶來的福利以及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的質量以及協調問題。可以說，地方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如果從政績考核上看，都是 GDP 惹的禍」^⑩。

在「分灶吃飯」的財政分權思路在中國社會表現出明顯的轉型特徵下，使得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的趨勢日益突出。經濟發展狀況幾乎成為地方政府政績表現的惟一指標，這在給地方政府帶來壓力的同時，也刺激了地方政府以經濟發展來謀取更大的利益，表現出更強的「地方法團主義」—地方政府成為包辦各行各樣的巨型的事業公司—和自利傾向。再加上地方政府官員具有極強的升遷欲望和擴張衝動，他們在利用各種手段為自己的政績增加砝碼的同時，彼此的明爭暗鬥便得以形成^⑪。

三、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

在目前所知的各國不同發展觀的轉型之中^⑫，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çois Perroux, 1903—1987）的觀點再度受到重視。佩魯關於人類發展的新思維不僅修正了西方「唯經濟增長」的發展觀，中國的科學發展觀也從中進行大量的思想借鑒和啓示。

在 20 世紀中，從 1934 年熊彼特（J. Schumpeter）的經濟發展理論到 1955 年劉易斯（W. A. Lewis）的經濟增長理論，再到羅斯托（W. W. 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經濟增長理論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然而，無論是「增長」或「發展」，在主流經濟學中都只是指「物的增長」而不是「人的發展」；作為反對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大將，弗朗索瓦·佩魯扭轉了這種「沒有人味」的經濟學，批判了新古典主義「見物不見人」的貴族經濟學家；佩魯全部著作旨在表達一貫的人本主義信念：所有的經濟學只能是以人為目的，並且始終以實現人的價值為終極目標。

儘管不是出自嚴肅的規劃，而是回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對第三世界國家一項綜合發展研究成果的補充說明，佩魯的新發展觀（*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註⑩ 李一花，「『地方政府競爭』的經濟學分析」，廣西財政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南寧），第 18 卷 1 期（2005 年 2 月），頁 8。

註⑪ 任勇、肖宇，「當代中國地方政府競爭的內涵、特徵以及治理」，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呼河浩特），第 2 期（2005 年），頁 29~33；丘海雄、徐建牛，「市場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述評」，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2 期（2004 年），頁 24~30。

註⑫ 伍俊斌，「國外發展理論的歷史嬗變及其意義」，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太原），第 29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3~26。

Tenets) 一書出版以來，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社會綜合發展戰略的指導原則。佩魯首先指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長期以來對社會底層人民的漠視和對新興國家現實經驗的扭曲，已受到廣泛的批判和抵制。這一趨勢促使經濟學家對「發展」(development)這一耳熟能詳字眼的經濟意涵和分析工具，進行全盤反思和根本變革。另一方面，在國際經濟新秩序中，新發展已經成為共同性的工作，「它的理論及其貫徹實施都要求對經濟思維的基本原則進行再思考」。這裏所謂的再思考，是指對傳統經濟「有限條件的最大化」(maximization within limiting conditions)這一理性經濟學的準則或範型提出質疑。換言之，在面對傳統經濟主張以最低成本追求最大化、最佳化之增長效果時，人們必須重新思考至今被遺忘的問題：誰的最大化？對什麼進行最大化？以及最大化所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果^④。

這裏所謂漠視和扭曲，是指主流經濟學庸俗唯物主義、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諸般傾向，一種將人的生活歸結為物的活動、將人的價值貶低為財富積累的工具、將人類素質歸結為數字之高低演變的意識形態。佩魯申明，經濟學是一種「人群關係」而不是「人財關係」的科學。佩魯要求人們重新思考和追問，經濟學的目的是什麼？是純粹表現在統計數字上財貨的增加？還是人的智能與幸福的提升？增長的目的是什麼？是 GDP 的增加？還是生態的耗損？國民收入的增加意味著什麼？是存摺簿裏數字的增加？還是根本是超時勞動和親人疏離的結果？對此，佩魯反駁道：

人不是作為市場的奴隸和被迫接受現行價格體系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而是有能力通過精心規劃和組織為改變其環境這一目的而從事各種活動的真正的人及其群體。產品總額的增長，如果使自然資源惡化甚至毀滅自然資源的話，就會造成竭澤而漁的結果(impooverishing effect)。……危害人或毀滅人的可能性，不在這一增長率的考慮範圍之列，因為它對於用形象語言描述為人類資本貶值的問題漠不關心……^⑤。

佩魯提出組合了整體、綜合、內生於有機統一之下的新發展觀，而對這種新發展觀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場機制，而是文化價值；因為市場總是受到「統治力量」(dominating positions)和「改變各種不同商品與服務之比價」政策的干擾，其惡劣結果已經獲得證明，市場不會自動保證實現可被各國內部或各國之間共同接受的收益分配。佩魯強調傳統經濟根本的不合理性就在於「以市場機制取代行為者的活動與決策」，從而忽略了利益分佈的不平衡以及貧困問題的存在。

佩魯的觀點對正在思索和建構新發展戰略的中國至為受用。對此，佩魯對正在實行內部改革以便打入世界經濟圈的發展中國家，提出了所謂「發展的關鍵問題」，那

註④ François Perroux,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Tenets* (London & Canberra: Croomhelm, 1983), pp. 16~18.

註⑤ *Ibid*, p. 30.

就是「制定新的標準並找到使舊價值觀念更新但又不是歪曲它們的新手段」，這種新手段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

1. 在一個漫長的時期內，發展中國家必須就生活條件、文化和政治意志的鍛練提高個人和群體的標準（社會前進條件）
2. 它必須始終使特殊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向著最佳一般結構的方向發展，以促進該共同體每一個各別成員的個性全面發展（良好結構條件）
3. 一旦具備了這兩個先決條件，它必須盡可能迅速地促使革新和投資的效益、科學知識和藝術創造性在整個人口中普及^⑥。

四、阿瑪蒂亞·森：自由發展觀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Kumar Sen, 1933—）所提出的「發展—自由觀」，可以作為今日探討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參照和闡釋基礎。阿瑪蒂亞·森「發展就是自由」的觀點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崇高的倫理色彩，實際上也是出自對政治不民主、社會不公正、能力不平等、貧富不均衡、環境不正義等等之深度關切所蘊釀而生的，其不僅呼應並深化聯合國「發展計畫署」提出的「人類發展」概念，也對中國追求和諧社會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阿瑪蒂亞·森被稱為「窮人的經濟學家」，其所提出的一套不同於西方的「第三世界發展觀」，著重於對貧富不均、發展失衡和解決貧困問題等等，對中國的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阿瑪蒂亞·森對傳統上把人視為「經濟人」，從而導致社會發展的技術化、反人性提出了批評。他指出，傳統發展觀把效率（效用）邏輯作為發展的唯一尺度，當這些功利性原則被推向極端之後，必然造成對人的精神與情感的矮化和漠視。傳統發展模式只注重「如何發展的更快」來滿足人的物質需求，而不關心「人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以及關於如何培養人的美德或實現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的這類問題^⑦。

阿瑪蒂亞·森將發展視為「一種擴展人們享有真實自由的過程」^⑧。他摒棄了那種把財富的增長和福利的增加視為增長的觀點，批判了單純把經濟增長直接等同發展的觀點，而把發展定位於對「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之能力」的追求和保障，在此意義上，發展是一個綜合過程，也就是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教育、健康等等在內的整體價值的實現，它意味著在消除貧困、人身依附、各種歧視性壓迫與缺乏法治權利和社會保障等等目標的實現。換言之，發展首先需要對「反發展」—人的自由的阻礙與剝奪—的消除，也就是排除產生「不自由」的來源要素，包括貧窮與暴政、經濟機會的缺乏和徹底的社會剝削、漠視公共設施，以及政治上不容異己和過度鎮壓的行為。

但是阿瑪蒂亞·森的「發展即自由」的觀點也不是把發展帶向「單一自由」目標

註⑥ Ibid, pp. 41~42.

註⑦ 王宇、王文玉譯，Amartya Sen 著，*倫理學與經濟學*（北京：商務出版社，2000 年），頁 10。

註⑧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 3.

的簡單推理，而是一種把自由視為一組或多項之綜合價值，其本身既作為互為增強、交相促進的工具，又作為公民社會與國家政策之終極目標。因此，阿瑪蒂亞·森的自由觀是一種「系統自由觀」：自由既是一種建構性的價值，但更重要的又是以因果關係聯繫著本項自由與他項自由的工具性動力，亦即每項自由既是目的本身又是促進其他自由之工具和手段。於是，阿瑪蒂亞·森把工具性自由的類型區分為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s）、經濟便利（economic facilities）、社會機會（social opportunities）、透明度保障（transparency guarantees）、安全保護（protective security）等五種。但每一種自由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關聯的。這種關聯性不僅使得任何建構性自由得以落實和操作，更是實現個人能力與公共利益之互為發展的重要條件。「助長個人能力與一般實質自由的公共政策，能夠透過這些彼此不同但相關的工具性自由而運作」^⑨。在此意義上，探討抽象的自由概念是沒有意義的，瞭解這些不同類型自由之間的「實證關聯」（empirical connection）才是重要的。換言之，真正廣義的發展，既不是訴諸一套精巧規劃、嚴密計算的經濟發展計劃，也不是使每個人僅僅成為被動受惠者，而是促成上述各種自由之實證效果的實現。

進一步來說，阿瑪蒂亞·森所謂的「自由」並不是抽象的、個人的、形上的目標，而是一個既作為發展之評價標準（評價性理由，evaluation reason）和決定發展之有效性（有效性，effectiveness reason）的基礎，又是一個社會整合的過程（integrated process），亦即一種「彼此關聯的實質自由的擴張的整合過程」^⑩。在此同時，以自由作為發展的核心還可以是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藉由這種寬廣的方法，可以對不同的制度－市場及其相關組織、政府和地方當局、政黨和公民組織、教育安排與公開對話和辯論的機會（包括媒體和其他溝通媒介）－在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理解。實際上，阿瑪蒂亞·森所提出的自由觀，不僅限於觀察、探討和評價正式的組織，而且還涵蓋非正式、無形的組織和文化價值觀念：

社會價值和習俗所扮演的角色會影響人們所享受並有理由去珍惜的自由。分享的社會規範會影響社會特徵，如性別平等、兒童照顧的性質、家庭規模和生育形態、環境事務的處理，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安排和結果。主流價值和社會習俗也會影響腐敗的存在與否，以及信用在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上的角色。自由的運用受到價值的調解，但是價值會受到公共討論與社會互動的影響，後兩者本身則又受到參與的自由所影響^⑪。

自由勝於溫飽、人的尊嚴重於所得、文化價值應置於經濟增長之前的觀念，並不只是一種道德垃圾或倫理幻想，其在歷史中已不乏先例。阿瑪蒂亞·森引用 Robert

註⑨ Ibid, Introduction, p. 10.

註⑩ Ibid, p. 8

註⑪ Ibid, p. 9

Fogel 和 Stanley Engerman 對美國黑奴經濟制度所作的經典研究（後以二卷本受難時刻：美國黑奴制度經濟學[*Tin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一書出版）^⑦，指出當時黑奴的消費能力要比當時的自由農業勞工的所得水準高一至少絕不會比較低，而且黑奴的平均壽命幾乎與先進國家如法國和荷蘭相同，甚至遠比在美國和歐洲都市中的自由工人要長，但是，黑奴還是要逃跑。實際上，即使在廢除黑奴制度後，原先的雇主想要用高工資誘惑過去的奴隸回來工作，特別是以工隊（gang work）的形式，也沒有獲得成功^⑧。阿瑪蒂亞·森強調，自由本身與市場沒有直接的關聯，與是否充分就業或勞動條件好壞也沒有必然的關係，因為自由的喪失是一切喪失的基礎，「自由的喪失，不管是因為沒有就業選擇，或受制於專制的工作形式，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剝奪」^⑨。

在阿瑪蒂亞·森看來，經濟學界多年來爭論「市場機制」是否有助於發展，其實是一件很無聊的事。市場固然是商品交易、價值交換的制度，是實現收益與增長的程序，但市場機制首先建立在「市場進入與退出的自由機制」之上。對於許多根本無權進入市場的人而言，市場機制有何意義？阿瑪蒂亞·森先前在《貧困與饑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中已經證明，貧窮不是所得與勞動力的不足，其根本原因在於經濟不自由，從市場機制完全無法發揮拯救大饑荒的慘痛經驗得出教訓：「極端貧窮所呈現的經濟上的不自由，可以讓一個人成為其他的自由衝突下無助的犧牲品」^⑩。

阿瑪蒂亞·森強調，探討自由問題遠不及重視如何防止自由的被剝奪（deprivation），因此，阿瑪蒂亞·森的「實質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是指自由之免於被剝奪的基本能力，包括免於饑餓、營養不良、可治疾病與早夭等等的權利，以及識字和算術的能力、政治參與和自由言論等等。這些自由之所以被稱為「構成性的」（constitutive），是因為它本身就是發展的目的，而不是再去充當其他經濟目標的工具。而在這些實質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力」（capability）。所謂「能力」有兩個內涵，一是指個人選擇認為有價值的生活的能力，它不只包括實現個人基本利益的能力，還包括轉換基本利益為個人目標實現能力的相關個人特徵；另一個內涵是指個人成就各種認為值得做或值得存在之事物的「能力集合」（the capability set）^⑪。

最後，瑪蒂亞·森把「發展」歸結為個人自由與社會承諾的過程，並把發展定義為對自由的保障：

註⑦ Robert Fogel (1926—) 是美國知名「俄猶後裔」的經濟學家，與 Douglass North 同獲 199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Fogel 是「計量經濟史」和「歷史計量學」（Cliometrics）的重要代表。他反對以道德立場來看待黑奴經濟，他運用極為複雜的「種植記錄表」（plantation records），包括天氣變化與種子發芽的時間函數，黑奴日均勞動量的跨產業、跨國家比較，來研究黑奴經濟的效益問題。有趣的是，Fogel 強烈的「反道德立場」恰巧科學地證明了「黑奴為了自由而不是為了工資而逃跑」這一嚴肅的道德問題。

註⑧ Amartya Sen, *op. cit.*, pp. 28~29.

註⑨ *Ibid.*, p. 113.

註⑩ *Ibid.*, p. 8.

註⑪ *Ibid.*, pp. 74~76.

自由的特徵之一，是它有跟各類活動與制度有關的不同層面。但這並不意味發展是某些資本積累、市場開放，或有效率的經濟計劃的簡單「公式」。增進個人自由與社會承諾的過程，是整合這些發展特質的最高原則^⑦。

五、斯蒂格利茨：後華盛頓共識

Stiglitz 對新自由主義和西方霸權的批判，以及對「唯增長論」的質疑，構成了中國科學發展觀重要的思想來源。1990 年代以來，Stiglitz 的大量著作被引介進入中國，在學界與政治掀起一種「斯蒂格利茨熱」，可見其對中國各界影響的重大。

作為「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最主要的批判者，Stiglitz 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1989 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視為一種「帝國主義的經濟學」，並且應為拉丁美洲的經濟失敗負起最大的責任。理由是這一共識只是利用一組手段（包括宏觀調控、貿易自由化、私有化），來實現一組相對狹隘的目標（經濟增長）。對此，Stiglitz 提出了「後華盛頓共識」^⑧，一種以更多元的手段來追求更廣泛目標的新發展計劃。這項計劃的重心不在於數字的增長本身，而是人類生活品質的提高，包括改善衛生和教育，而不僅僅是增加可衡量的 GDP，它尋求的是可持續發展，包括保護自然資源和維護健康的環境。Stiglitz 強調，「後華盛頓發展」（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追求的是公正的發展，它是一種確保社會所有團體而不是上層集團獨享的發展；它同時還是一種民主發展，它能使公民以各種方式參與作出影響他們生活品質的決定^⑨。

Stiglitz 強調政府的核心地位與作用，主張通過多重政策、共同實施以實現多目標和多元價值的觀點，對「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啟示與補充作用。特別是他提出的「政府有效干預」的理論，既符合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對中國政府相當受用。

六、「新稀缺時代」的來臨

著名的生態經濟學 Herman Daly 通過航海制度中的「滿載線」（Plimsoll line）這一概念來說明，傳統宏觀經濟學關注的是如何將貨物「平均地」配置在一條船上，以免重心不穩而翻船；穩態經濟學則提出警告，即使再均勻的配置，一旦貨物過重，一樣會沉船，即使是均衡地的沉船！

在強調「最優配置」的傳統經濟學中，價格－市場中對稀缺性的交易成本－是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基本工具，但是「最佳配置」並不等於「最佳規模」，因為前者旨在

註⑦ *Ibid*, pp. 297~298.

註⑧ Joseph J. Stiglitz,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s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resented as the WIDER Annual Lecture, at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 Helsinki, 1998, <http://www.wider.unu.edu/events/annuel1998.htm>.

註⑨ 段麗萍譯，Joseph E. Stiglitz 著，「後華盛頓共識（下）」，國外社會科學文摘（上海），第2期（1999年），頁19。

追求最大的增長以解決最佳的分配，後者則以最優的平衡維持最低成本的生命收益，甚至說，以零增長—穩態為基準的規模論與追求無限增長的配置論，必然處於「永續衝突」之中。

傳統經濟學只重視實現最佳分配的「市場價格」，卻忽略或完全不去計算「影子價格」，即生態系統的耗損與高人口或高人均資源使用量的邊際社會效應，這是一種在耗散環境資源之後卻無法被支付性的隱性價格。戴利也指出，面對影子價格——一種根本無法準用商品之機會成本來確定和分攤的成本——人們至今依然採取不可救藥的樂觀態度，認為人類集體性行為所造成的系統性破壞（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空洞），依然可以借助環保教育和人們自覺性補償獲得解決。但實際上，生態系統並不對市場價格作出反應。生態系統既不是服務業，也不是製造業，它並不因為顧客需求的提高而增加自身的服務和產出；相反的，人類對它的需索越多，它就越容易翻臉和反噬！

「影子價格」這一概念是針對以「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為假設的古典經濟學的翻修和重訂。相對於市場價格，影子價格不是基於市場交換下的「支付關係」，而是基於生命共存意義下的「信託關係」，也就是聯繫著貧苦者、未來子孫和其他生命物種於一種友善與慈愛的倫理共生關係。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的價格都是可支付的，例如生態資源，它一旦被耗損，就無法再付款買回。

在傳統經濟學中，「資本」通常指資金、技術、勞力、生產工具等等，但是戴利將傳統意義的資本視為「人造資本」，而作為人造資本之基礎的則是「自然資本」。正如如果沒有森林（自然資本），再大的鋸木廠（人造資本）也毫無意義，如果魚源（自然資本）枯竭，再多的漁船（人造資本）也無濟於事；人們過去總是錯誤地認定，基於稀缺性原理，人造資本的增加和改進具有替代自然資本的作用。但戴利認為，人造資本與自然資本的關係不是替代性，而是互補性；即使傳統經濟學的「替代理論」可以成立，但正如每增加一艘漁船（人造資本）就必須有一定數量之魚群（自然資本）的增加一樣，「生產越多的替代物（人造資本），物質上就需要更多的被替代物（自然資本）——作為其互補條件」^⑩。由此可以看出，以「增長」掛帥的經濟學總是在破壞兩種資本之間的互補性——建造過多的漁船來撈補日漸稀少的魚群——即使運用科技養殖來替代，也只是在更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本的前提下進行的。基於此，戴利認定，「最大限度提高人造資本的生產率和積累的現行政策已經不再是『經濟的』」^⑪，這意味著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一種「新稀缺時代」——不是人造資本的不足，而是剩餘自然資本的嚴重稀缺。因此，人類應該告別對人造資本的投資，轉向對自然資本的投資，並使自然資本的投資規模始終大於或先於人造資本的投資，才能使可持續發展獲得真正的實現。

註⑩ 諸大建、胡聖譯，Herman Daly 著，*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頁 76。

註⑪ 同前註，頁 113。

七、從物本論到人本論：人本經濟學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促進了人們對經濟活動在建構人的價值意義上的重新思考。經濟發展的目的何在？發展的方式與手段如何促進而不是背離人的需求、願望和理想。經濟發展在實現物的增殖時如何帶動人的價值的增殖？一種以人文本的發展觀應如何落實到人的日常實踐和生活世界，從而通過人類實踐以達到人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類全體的共同發展。

概括在今日「人本經濟學」這一命題之下，亦即提出「以人文本」以區別於傳統「以物為本」的古典經濟學，在 1980 年代的中國已經有人提出，惟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上是以追求高速增長之國民收入為目標，以經濟硬體建設為核心－之黨的路線與國家政策支配下，「人本經濟學」一度受到邊緣化。1980 年 11 月，中國經濟學家巫繼學就以「自主勞動範疇初探」一文，發表其在 1970 年代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以自主勞動 (Autonomous labour) 為中心的人本經濟學 (Anthropocentric Economics)」，以區別於傳統的物本經濟學 (Materialcentric Economics) ②。1995 年，巫繼學再度提出「人本經濟學宣言」，指出作為一門成熟的經濟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必然將經濟生活中的人作為對象，必然以人為中心、為元本、為主體、為基點來展開理論體系。這種對象取向的經濟學，實質上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學③。另外也有學者提出「人本型」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④；除此之外，筆者亦曾通過闡釋馬克思的巴黎手稿討論了「自覺勞動－非異化勞動」這一範疇，提出諸如「自我復歸」、「自我展現」、「自我實現」、「感性實踐」等等關於人本經濟學概念的討論⑤。今日，在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後，曾經一度沉寂的「人本經濟」再度受到重視。

「人本經濟學」是一種倫理經濟學，其與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文本」的典範，具有高度的吻合性與參照性。如前所述，從「物本」到「人本」的轉向，是新發展觀重要的面向，並立足於對「物本經濟學」的批判與挑戰，重新強調「發展」無非是人們實踐方式的改善，無非是人們的現實存在價值到理想存在價值之間的增值。這種轉向標誌著對人類生存基本價值的強調已從以物的價值產出的增加和積累，轉向人的價值內涵的提升和改善。「發展」一詞應被理解為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系統的人類實踐方式的歷時性改善，是人們的現實存在價值到理想存在價值之間的價值增值，而「經濟發展」一詞則應被理解為「人們經濟活動方式的改善」⑥。

中國經濟學家陳惠雄進一步以「快樂最大化」原則和「生命成本」概念，來說明「人本經濟學」中人本價值的核心，並把「人本經濟學」定位於關於人的生命現象之

註② 巫繼學，自主勞動：人本經濟學探索（杭州：浙江教育，1998 年），頁 399。

註③ 巫繼學，「人本經濟學宣言」，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 5 期（1995 年），頁 3；張萊楠，「創新之源－新經濟時代人類個性復興的探究」，現代管理科學（南京），第 1 期（2005 年），頁 53~54。

註④ 尹慶雙，「試論『人本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特徵」，經濟體制改革（成都），第 5 期（1999 年），頁 33~35。

註⑤ 宋國誠，前引書，頁 80、128、138、432。

註⑥ 張萬鐸，「人本論的經濟發展觀」，貴州社會科學（貴陽），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59。

系統闡釋的科學。陳惠雄指出，傳統古典經濟學把消費定義為商品與勞務之效用的滿足，人本經濟則將消費視為人的快樂的獲取。陳惠雄甚至主張用「快樂學」（Hedonomics）取代「經濟學」（Economics），用「國民快樂總值」（GHP）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NP）^⑧。

人本經濟學批評古典經濟學的「狹義消費論」忽略了消費的根本意義以及更加廣泛的生態（免費）的內容，它導致雖然 GDP 上升了但人卻貧窮的悖論性結果。主流經濟學不把環境問題納入它的理論體系，是一種基於「末端治理」的理念，但人本經濟學則相反，它「為我們取捨生活，保護生態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與『開端治理』發展模式提供了理論依據」。在此意義上，「人本經濟」是從人自身的主體性出發，又置於人與對象的「互為主體」前提之下，並最終收斂於人自身的價值尺度的人本主義思想。而建立在這種「互為主體之人本價值」的經濟學，被稱為「人本經濟學」，它「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也有別於社會經濟學，它的把經濟發展的目的與手段皆抽象與歸結為人類自身的生命現象進行解釋的系統觀點」^⑨。

人本經濟學將「經濟人」置換為「自由人」，從而重新界定了經濟主體的本質與屬性。所謂「經濟主體性」是指在生產力中起決定作用的人的因素的存在，它來自馬克思「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基本概念，即具有能動性、創造性和自主性的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因此，人本主義導向的中國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必須從個人的主體性、企業家的主體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性這三個方面去構建。陳惠雄則提出了「有限成本約束條件下的快樂最大化」，認為「經濟發展根本上是要解決以盡可能少的生命成本付出獲得盡可能多的快樂滿足的問題」，並認為「最少生命成本 / 最大快樂滿足」這一原則，是「人類所有經濟行為的根本出發點與歸宿處」^⑩。

通過對主流經濟理論效用價值、邊際效用、理性經濟人、機會成本、帕累托效率、自由選擇、自由放任等核心概念和假設的嚴厲批判，以及對經濟全球化、生態等重大問題的重新審視，人本經濟學主張當前迫切需要超越以自我和效用為中心的價值觀，樹立社會價值觀，實現真正的自我，盡可能地發展人的潛力^⑪。曾經一度被忽視的人本經濟學，為今日科學發展觀提供了理論的養料和實踐基礎，使科學發展觀不致淪為單純的哲學分析，也不是簡單的政治口號，而是一種有科學依據和理論指導性的發展學說。

註⑧ 陳惠雄，「經濟與人本：關於科學發展觀的兩個基礎理論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杭州），第 35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46。

註⑨ 劉志彪、丁棟虹，「人本主義導向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唯實*（南京），第 4 期（1999 年），頁 16~21。

註⑩ 陳惠雄，「人本經濟學的重要理論觀點」，*財經論叢*（杭州），第 3 期（2004 年 5 月），頁 68~73；陳惠雄，「追索經濟真的心路歷程——《人本經濟學原理》述要」，*管理世界*（北京），第 8 期（2004 年），頁 153。

註⑪ 王曉林，「科學發展觀對人本經濟學研究的啟示」，*現代財經*（天津），第 24 卷第 11 期（2004 年 11 月），頁 6。

伍、政府模式的轉變

中共總理溫家寶 2004 年 2 月 21 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隨後，中共「十六大」六全會確立了政府職能的四項目標：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這意味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客觀地要求政府模式與職能的轉變已成為公認的共識。在這裏，筆者將政府模式與政府職能作出區分，因為模式的定位將影響職能的選擇。前述所謂「四項目標」，其中前三項涉及的是政府的治理職能，最後一項則涉及政府組織的模式選擇。

20 世紀以來政府模式的轉變大致經歷從「統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務型」的轉變^①。所謂「服務型政府」，依據最常被中國學界引述的觀點，是指「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爲公民服務爲宗旨並承擔著服務責任的政府」^②，並指出這一定位強調在管理理念、哲學與體上「對傳統『管制型政府』的全方位變革」^③，亦即強調公民社會本位的概念已經有別於過去的官僚行政本位，民主秩序框架有別於權威命令程序，公民意志有別於國家意志，而服務責任則有別於官僚服從義務。

既言變革，而且是全方位變革，就存在一個轉變或調整傳統政府之模式結構與運作職能的路徑選擇，亦即政府轉型的目標。換言之，科學發展觀將促使中國政府從原先官僚型、指令式的政府，向民主型、服務式的政府邁進。關於什麼是「公共服務型」政府其有關涵意，各界已多所討論。它涉及了模式選擇和職能轉化兩條路徑。關於「兩條路徑選擇」的問題應另文專題討論，本文只能或首先討論關於政府轉型的觀念轉型。

一、政府與市場：夥伴關係

政府干預和市場放任的爭論，在經濟學界始終沒有停止過，但實際上，政府模式不只一種，市場經濟也不是只有一種形式，而是多種樣式。但由於政府和市場都會面臨「失靈」（「政府失靈」又被稱爲「非市場缺陷」）^④，迄今爲止關於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就像父子關係究竟應管多還是管少？始終沒有答案。對此 Stiglitz 提出國家與市場應是「夥伴關係」的觀點，認爲國家應作爲輔助市場健全化的補充和糾正市場失敗的行動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應該地位平等、相互合作、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替代

註① 張忠友，「公共服務型政府探析」，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太原），第 30 卷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95。

註② 劉熙瑞，「服務型政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 7 期（2002 年），頁 5。

註③ 劉熙瑞，「服務型政府：本質及其理論基礎」，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北京），第 5 期（2004 年），頁 25。

註④ Charles Wolf Jr., *Markets or Governmen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0)。

⑤。

固然，政府往往因為缺乏明確的參與目標而使行政效率低落，但政府站在戰略高度並集中於主要事務的治理－經濟政策、基礎教育、衛生、法律、社會秩序、環境保護，應是最關鍵的。但政府目標的選擇不在於「應然與否」，而在於「如何參與」。Stiglitz 指出，「關鍵問題應該不是政府規模，而是政府的活動和方法，一些成功的國家的政府都參與範圍廣泛的活動」⑥。

所謂政府與市場「夥伴關係」必須體認到如下的事實：在一種本質上是不完全訊息的條件下（客觀上並不存在完全訊息條件），市場失靈的情況依然會在政府身上發生，但這不表示政府在應該在社會生活中完全退出或袖手旁觀；其次，政府與市場的夥伴關係是一種長久關係，政府對市場的監督、補充和作為社會福利的創造者與提供者，是一種常態的、持續的服務。政府並不是在市場失靈時才出現。換言之，政府不僅僅是市場危機的代理人或救火員；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是一種「你（我）強、我（你）弱」的替代關係，當市場機制越發達時，政府的職能就越重要，而不是相反。

二、政府與人民：善治關係

中共十七大確立了「建立和諧社會」的原則之後，客觀上也要求政府治理職能朝向以人為本的良政與善治的方向發展。1960 年代以來興起的「新公共行政」（或稱「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理念－不再強調技術，而偏重於人本主義，並重視社會公平、代表性、響應、參與及社會責任感，強調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與公共服務的發展、管理與評估以確保更高程度的社會公平⑦－也督促著中國朝向以政治權力之重分配為核心的政府改革，加上當代「後現代公共行政」（postmodern administration）的興起，在批判傳統官僚體制並強調公共領域與公共論述－「公共能量場」－之重要性的影響下⑧，也形成對中國新的發展思維的衝擊與啓示。

當前，通過對西方新政府理論的中國語境化之後，「善治」（good governance）－良好的治理－由於「善治制度」不與堅持「多黨合作下共產黨領導」的正統政治原則相抵觸，在語境轉化和制度移植中具有可接受的優先性－已被視為中國在科學發展觀下推動政府改革－特別是在「政－民關係」上－的重要目標。

註⑤ 張潔琚、陳國權，「政府與市場：建構新型的夥伴關係－斯蒂格利茨經濟學說中的政府理論評析」，新視野（北京），第 2 期（2000 年），頁 36~38。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張夢中譯，Terry Konn & Marc Holzer 著，「新公共行政：尋求社會公平與民主價值」，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 2 期（2001 年），頁 43~46；崔光勝，「論西方公共行政精神的嬗變」，湖北行政學院學報（武漢），第 5 期（2007 年），頁 21~24。

註⑧ 吳瑞堅，「公共能量場隱喻與後現代公共行政範式－福克斯·米勒後現代公共行政述評」，雲南行政學院學報（昆明），第 5 期（2007 年），頁 38~40。張再林，「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對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啓示」，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第 24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41~42、52。

善治是對「治理」可能面臨的失敗並期求通過更好的「政民合作」而提出的^⑩，它反映出全球化趨勢下「公民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開始承擔重要的社會職能，成為政府和市場這一軸心之外新的整合社會力量。特別是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之後，各國政府將面臨包括諸如亞洲金融危機、SARS、瘋牛病、禽流感等等已知的和未知的「全球風險」，這將促使政府必須走出官僚與法令的邊界，採取有效的社會政策並向外尋求治理合作，其結果是導致一個「單一／統制」型政府模式的瓦解，和新型政府模式的重新建構。

俞可平將「善治」定義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與特徵就在於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係，是兩者的最佳狀態^⑪，並認為「善治」至少應該包含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責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 of law）、回應（responsiveness）等五大要素^⑫。從根本上說，「善治」還涉及對政府權力的多元性、社會化、互助式的重分配，亦即「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⑬，這對應於 1980 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自組織和中介組織的快速成長，具有客觀的必要性。於是，一種「多中心治理」的概念也被提出，期待在公共服務的生產者、提供者、消費者之間建立有效競爭、誘導激勵、提高公共服務品質、增進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⑭。

陸、矛盾與落差：並非以人為本的「社會排斥」

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國未來最高的轉型戰略，目前還只是停留在紙上規劃、主觀願景的階段，對照於中國的社會現實，特別是對照於歷經多次革依然病重難治的社會矛盾而言，其中的落差與挫折至為明顯。限於篇幅，這裏僅就「社會排斥」——它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悖論命題與逆反結構——加以討論。

科學發展觀標舉「以人為本」的思想，但對於當前中國基於不同社會群體在社會權利上的高度失衡所導致的結構裂痕，以及在社會階層化中失去競爭能力與優勢之「弱勢群體」的大量湧現，以及因為信任匱乏所導致大量失範行為的泛濫，人們已逐漸以失望性的「斷裂社會」來形容今天中國的現實。

「社會斷裂」——社會各階層缺乏有效的整合與有機的聯繫的成因來自「社會排

註⑩ 漆燕譯，鮑勃·杰索普（Bob Jessop）著，「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濟發展為例的論述」，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北京），第 1 期（1999 年），頁 31~48。

註⑪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北京），第 5 期（1999 年），頁 39~40。

註⑫ 梁瑩，「治理視角下我國政府改革的新思維」，理論與改革（成都），第 2 期（2003 年），頁 48。

註⑬ 李海燕，「競爭、多中心治道與我國公共服務改革」，河南社會科學（鄭州），第 12 卷第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22~24。

斥」^⑩，並進一步與社會失衡問題形成既相互推升又互為因果的關係。「社會排斥」概念起源於 1970—1980 年代，原本用來解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貧窮」（new Poverty），認為這種新而複雜的貧窮問題主要起源於社會聯繫（social bond）的匱乏與社會團結程度的下降，例如家庭破碎、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階級分裂、排外歧視、郊區衰敗等等^⑪。Strobel 將「社會排斥」定義為某些群體被社會淘汰出局，被甩出於社會結構之外，他們享受不到人類權利^⑫。另一方面，社會排斥涉及到社會結構的脆弱化，它因為社會結構的強／弱二元分化而形成雙重性的社會風險^⑬。換言之，「社會排斥」不單是指貧窮，它還包括弱勢群體如何透過不同的過程排斥於主流社會之外，進而被邊緣化^⑭。

與「社會排斥」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概念則是「政策排斥」（或「社會權利貧困」），這是指「政府頒佈的將一部分社會成員排除在政策覆蓋之外而使他們得不到應有的社會權利實現的各種政策與規定」，進而形成「將一部分社會持員推至社會邊緣的機制與過程」^⑮。社會邊緣化現象與公民身分不足和「非參與性」（non-participation）有關，它表現為多樣性被剝奪的狀態或社會主要方面的參與缺乏^⑯。以「能力剝奪」為核心概念研究貧困問題多年的阿瑪蒂亞·森於 1998 年重申「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用以解釋廣義的貧困問題，包括收入不足的貧困與能力不足的貧困^⑰，他甚至把「不能穿著體面地出入公共場所」也視為一種社會文化意義上的貧困。實際上，經濟意義上的「能力剝奪」在社會學上的解釋就是「公民資格

註⑩ 孫立平，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頁自序 5。

註⑪ Hilary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5/6 (1994), pp. 531~578；景曉芬，「『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綜述」，*甘肅理論學刊*（蘭州），第 2 期（2004 年 3 月），頁 20~24；洪朝輝，「論社會權利的『貧困』——中國城市貧困的根源與治理路徑」，*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第 4 期（2002 年），<http://www.cgarden.net/StubArticle.asp?issue=020402&total=79>；洪朝輝，「論中國城市社會權利的貧困」，*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 2 期（2003 年），頁 116~125；錢志鴻、黃大志，「城市貧困、社會排斥和社會極化——當代西方城市貧困研究綜述」，*國外社會科學*（北京），第 1 期（2004 年），頁 54~60；丁開傑編譯，Tony Atkinson 著，「社會排斥、貧困與失業」，*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第 3 期（2005 年），頁 10~11。

註⑫ P. Strobel, "From Poverty to Exclusion: A Wage-Earning Society to a Society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48 (1996) pp. 173~189.

註⑬ Janie Percy-smith,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

註⑭ 潘澤泉，「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發展困境與社會風險」，*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1 期（2004 年），頁 87；潘澤泉，*社會、主體性與秩序：農民工研究的空間轉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194。

註⑮ 周湘斌，「我國社會轉型時期農民群體的社會權利與政策性排斥」，*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北京），第 20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15。

註⑯ Claire Dorsner, "Social Exclu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38, no. 4 (2004), pp. 366~382.

註⑰ 王燕燕譯，Amartya Sen 著，「論社會排斥」，*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第 3 期（2005 年），頁 1~7。

的剝奪」，它在經濟面向之外——社會權利的非兌現——對貧困作出了更深刻的分析。

對中國而言，特別是面對經過多年整治卻依然不見起效的農村貧困問題，在經歷政策上大力推動「扶貧」、「脫貧」、「減貧」之後卻依然產生「返貧」、「新貧」等等返潮現象，許多文獻與調查一再證明「社會排斥」與農村持續性、再發性的貧困具有密切的關聯性。實際上，有關社會排斥的理論分析都可以在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中得到足夠的證據^⑩，換言之，「社會排斥」不只是一個抽象概念或理論方法，而是中國弱勢群體的生活事實與生存狀態^⑪。

顯然，社會排斥是非人本的、非和諧的，它與「以人為本」和指向「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觀是截然對立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但中國農村存在的社會排斥既是廣泛的，也是多元的，僅從制度面來說，農民面臨了經濟面的、社會的、政治面的三種基本排斥。經濟面的社會排斥是指人們在獲取勞動生活資料的過程中遭遇到的不公正對待，它直接導致貧困的難以根治；社會面的社會排斥是指農民的社會權利受到損害或嚴重剝奪，政治層面的社會排斥是指農民群體基本政治權利的不足或被剝奪^⑫。在大力推展「科學發展」的同時，中國農村卻陷入「發展權匱乏」的窘境，呈現「滯後發展」的狀態。

當前中國農民面臨了「本地排斥」與「出外排斥」的雙重社會排斥。大量有關「失地農民」（總數約在 1.8 億以上，占總人口 1/10 以上）的研究，已說明了農民——由於政府徵收權的濫用和「低購高賣」徵地政策——在土地所有權上所遭受的深重剝奪^⑬。而當農民以「農民工」進城以後，則受到種種「出外排斥」。他們（進城農民）除了只能從事城市居民不願承擔的髒、累、苦、險的工作之外，還要繳交各種名目的城市居住稅費。從城市的有色眼鏡或歧視之眼來看待進城的農民工，他們（有時被冠以歧視字眼的「準市民」）往往被視為城市基礎建設過度負載的始作俑者、社會秩序的擾亂者、非法勾當和犯罪的製造者，成為保防、稅務、城管、公安等等單位的監控和管制。

除了農村以外，城市的社會排斥更趨繁多和複雜。以涉及外來人口管理的呈市「暫住證」為例，據新華網引述廣州日報的報導，2003 年 1 月 26 日，5 個被廣州市白雲區慶豐居委會治保隊搜查出沒有暫住證的外來工，被關上收容車後沒多久，便從高

註⑩ 唐鈞，「社會政策的基本目標：從克服貧困到消除社會排斥」，*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 3 期（2002 年），頁 42~43；唐鈞，*中國城市居民貧困線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年）。

註⑪ 馬廣海，「處於社會排斥中的弱勢群體」，*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青島），第 4 期（2004 年），頁 171。

註⑫ 段文娟，「論『社會排斥』與農村『新貧困』」，*重慶工商大學學報*（重慶），第 15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

註⑬ 廖小軍，*中國失地農民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劉華珍、雷洪，「失地農民的社會權利貧困」，*經濟與社會發展*（南寧），第 4 卷第 2 期（2006 年 2 月），頁 158~160；李一平，「城市化進程中杭州市近郊失地農民生存境況的實證調查和分析」，*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杭州），第 2 期（2004 年），頁 36~40；王翠英等，「陝西失地農民權益保障情況調查」，*理論導刊*（西安），第 8 期（2006 年），頁 76~78、81。

速行駛的收容車上一個接一個地掉下來，除1人受輕傷當場「逃跑」外，已有2人被醫院證實死亡，1人還在搶救中，還有1人下落不明。另一個也是涉及「暫住證」的悲劇是，一名從湖南到廣州打工的青年農民，沒有暫住證而丟了性命（究竟是他殺還是失足墜崖，工友和治安隊說法不一）。一個到廣東東莞打工的四川妹，因暫時未領到暫住證，竟被查證的治安員打成腦震盪^⑮。

對外來人口的社會排斥往往在「城市治理」的口號下，成為一種似乎與「以人文本」的科學發展觀毫不相關的習慣性現象。據北京媒體報報導，2001年3月23日，北京市政府準備將「暫住證」分為A、B、C三種類別，凡是外地來京的人口（約有300萬人，俗稱「北漂族」），居住滿3年以上的可領取A證，1年以上不足3年的領取B證，其餘不足1年的領取C證。此外，外地科技人員僅因屬於富裕貴族、身價不凡，就可以直接辦理A證，至於從事廢品收購、文化娛樂、喜浴髮廊等特種行業的，無論居住時間長短，一律只發給C證。而市政府將針對領取C證的加強管理，列為重點監控的對象^⑯。顯然，即使在首善之區，這種公然進行區分職業貴賤、人種高低的身份歧視，竟是由政府公然立法和執行的。而所謂暫住證的分類與管理，既無「科學」的依據，也與城市的「發展」無關。

城市居民中各種千奇百怪的社會排斥，與中共官方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口號，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想以及胡錦濤所宣稱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貼心話，形成的鮮明的落差和反諷。根據一項針對來自廣州、浙江義烏市、南京之外來人口關於「基本政治權利行使狀況」的調查顯示，中國沿海城市出現一種表現在外來務工群體之經濟貢獻與政治地位嚴重落差的現象：一方面，流動人口為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一方面卻又無法平等地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形成一種「利益差」^⑰。在今日中國，保守估計數量至少在8千萬至1億之間的流動人口，實際上是一支龐大的「政治邊緣人」，這與「和諧社會」所揭櫫和倡導的美麗圖像，完全不成比例。

柒、結 論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受到「強國之夢」的牽引和熱盼，受到多數人民急於擺脫貧困落後的局面，中國領導人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奉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種表述雖然有所差別，但共同的關注點都在於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都是採取現代化非均衡的發展戰略，整體的國家體制與社會生活無不深深打上「唯經濟主義」的烙印。在此之前，發展被簡單地等同於「經濟增長」，建設被等同於「物質建

註⑮ 「暫住證緣何成為民工的『夢魘』」，新華網，2008年5月7日瀏覽，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2/10/content_721847.htm。

註⑯ 李立，「外來人口，三六九等」，中國新聞周刊（北京），第14期（2001年4月9日），頁38-41。

註⑰ 傅丕毅等，「流動人口：政治邊緣人」，浙江人大（杭州），第5期（2005年），頁16-19。

設」，改革的指標被簡化為 GDP 的成長，並且認為「高速度」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高增長」就是中國改革的基本規律，「高積累」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表現。這種唯經濟主義的發展模式，固然中國領導人的焦灼心理和中國人民的迫切願望，也創造所謂「中國崛起」的奇蹟，但是在中國奇蹟的背後與周邊，卻也存在巨大的「中國危機」。

經過了「摸石過河」，如今面臨的是如何「離河上岸」。儘管作為第一要義的「經濟增長」，作為中國發展的「硬道理」並沒有全盤放棄，但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推動，中國將逐步告別 GDP 神話，轉變「以物為本的增長」成為「以人為本的發展」模式，轉變外部世界的增長成為以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公平發展、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轉變統治型、官僚制的政府體制成為以公共服務、顧客為上的服務型體制，進入全新的、廣泛的、複雜的發展階段，亦即進入本文所稱的「第三次社會轉型」。可以確認，「科學發展觀」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總體指標，其成敗將決定中國是否能夠成為 21 世紀文明大國，也悠關中國 13 億人口的前途與命運。

為了因應將「科學發展觀」樹立國家發展的指導綱領，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藍圖。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概括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六大特點：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決心以汲取中國政治哲學與民族智慧的方式，在追求效率之同時最大限度兼顧社會公平與分配正義的原則上，構建一個以人為本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明國家。

除此之外，為了深入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價值觀，並以之作為未來青少年教育的最高原則，中國大陸開始推行所謂「社會主義榮辱觀」，以協助青少年建立新型的社會人生觀。所謂「八榮八恥」，包括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公民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現，其正面的內涵就是愛國、服務、科學、簡約、團結、誠信、法治、勤奮等，從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為起點，力求在繼承傳統美德的基礎上，樹立現代道德理念。也就是在個人修為、社會公益、國家昌盛三個層面之間，建構一個和諧環境，以利於推動以科學發展觀為戰略方向的第三次社會轉型。

然而，不可諱言，「第三次社會轉型」的確立還需取決於科學發展觀能否未來持續的落實，能否真正成為中共執政的主軸和社會集體共識。關於這一方面，情勢還有待觀察。本文通過「社會排斥」這一對比性的分析視角，並以之對照當前中國的現會現實，可以看出「科學發展觀」仍然存有若干空中樓閣色彩，其與具體的社會現實之間仍存有相當的落差。

* * *

（收件：97 年 4 月 9 日，三審：97 年 5 月 12 日，修正：97 年 5 月 20 日，接受：97 年 6 月 9 日）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the Thir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Kuo-chen Sung

Research Fellow, Fourth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purpos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roposed at CCP 17th Congress. From model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o high speed growth, thir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trend and lessons of China’s reform experiences indicating four dimensions of developing perspective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sustainable and people-oriented. China has stepped on the crucial point, it will be a great challenge for China to choose between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 the trap of “Latin-American decoy”. It will als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China to consider over on the continued economic growth or the social welfare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hankering pursuit for Marxist theory of highest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Overall, it refe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economic system and governance that based on human subject from “Economic Man” to “Free 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 from consumptive to the sustainable, the style of government from the authoritarian to public service and from command to participation. This article proclaims that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a new model with humanist/economic/democratic cementation and conversion, and it’s final goal will be built on the fulfillment of common rich and sufficient society.

Keywords: CCP 17th Congres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Paris manuscripts; people oriented; human development; public service; good governance

參考文獻

- 「外媒稱十七大報告是一份涵蓋廣泛議題的報告」，中國網，2008 年 3 月 31 日瀏覽，http://big5.china.com.cn/17da/2007-10/16/content_9067919.htm。
- 「省部級主要領導進京研習新發展觀，曾慶紅講話」，新華網，2008 年 3 月 31 日瀏覽，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2/16/content_1316685.htm。
-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人民網，2007 年 10 月 15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05264/105268/6379572.html>。
- 「溫家寶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唐尼採訪」，新華網，2003 年 11 月 24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4/content_1193947_2.htm。
- 「暫住證緣何成為民工的『夢魘』」，新華網，2008 年 5 月 7 日瀏覽，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2/10/content_721847.htm。
- 丁開傑編譯，Tony Atkinson 著，「社會排斥、貧困與失業」，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第 3 期（2005 年），頁 10~11。
-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尹慶雙，「試論『人本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特徵」，經濟體制改革（成都），第 5 期（1999 年），頁 33~35。
- 牛文元，「可持續發展：21 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北京），2003 年 11 月 27 日，新浪網：<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3-11-27/1723261360.shtml>。
- 王宇、王文玉譯，Amartya Sen 著，倫理學與經濟學（北京：商務出版社，2000 年）。
- 王建新，「論後現代主義視域中的發展觀」，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新鄉），第 32 卷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35~38。
- 王雅林，「社會轉型理論的再構與創新發展」，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 2 期（2000 年），頁 168~173。
- 王翠英等，「陝西失地農民權益保障情況調查」，理論導刊（西安），第 8 期（2006 年），頁 76~78、81。
- 王曉林，「科學發展觀對人本經濟學研究的啓示」，現代財經（天津），第 24 卷第 11 期（2004 年 11 月），頁 6。
- 王燕燕譯，Joseph E. Stiglitz 著，「走向一種新的發展範式」，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第 1 期（2005 年），頁 1。
- 王燕燕譯，Amartya Sen 著，「論社會排斥」，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北京），第 3 期（2005 年），頁 1~7。
- 王煊，「詮釋 GDP 與中國全面小康」，武漢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武漢），第 16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76。

- 丘海雄、徐建牛，「市場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述評」，*社會學研究*（北京），第 2 期（2004 年），頁 24~30。
- 付子順，「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失效原因分析」，*科技諮詢導報*（北京），第 3 期（2007 年），頁 162~163。
- 白永秀、任保平，「從傳統發展觀到科學發展觀：發展觀的創新」，*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第 8 期（2004 年），頁 5。
- 伍俊斌，「國外發展理論的歷史嬗變及其意義」，*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太原），第 29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3~26。
- 伍裝，*中國經濟轉型分析導論*（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9。
- 任勇、肖宇，「當代中國地方政府競爭的內涵、特徵以及治理」，*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呼河浩特），第 2 期（2005 年），頁 29~33。
- 朱婭，「論經濟倫理與市場秩序」，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
- 何清漣，「中國經濟的反市場形態原因分析」，*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5 期（1990 年），頁 53~59。
- 吳敬璉主編，János Jorai 著，「大轉型」，*比較*，第 17 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年），頁 11。
- 吳瑞堅，「公共能量場隱喻與後現代公共行政範式－福克斯·米勒後現代公共行政述評」，*雲南行政學院學報*（昆明），第 5 期（2007 年），頁 38~40。
- 宋國誠，*馬克思的人文主義：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新探*（台北：桂冠出版社，1990）。
- 巫繼學，「人本經濟學宣言」，*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 5 期（1995 年），頁 3。
- 巫繼學，*自主勞動：人本經濟學探索*（杭州：浙江教育，1998 年）。
- 李一平，「城市化進程中杭州市近郊失地農民生存境況的實證調查和分析」，*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杭州），第 2 期（2004 年），頁 36~40。
- 李一花，「『地方政府競爭』的經濟學分析」，*廣西財政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南寧），第 18 卷 1 期（2005 年 2 月），頁 8。
- 李立，「外來人口，三六九等」，*中國新聞周刊*（北京），第 14 期（2001 年 4 月 9 日），頁 38~41。
- 李海燕，「競爭、多中心治道與我國公共服務改革」，*河南社會科學*（鄭州），第 12 卷第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22~24。
- 李培林，*另一隻看不見的手：社會結構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 李鋼，「論社會轉型的本質與意義」，*求實*（南昌），（2001 年 1 月），頁 55~57。
- 沙宏，「論後現代主義發展觀」，*社會科學輯刊*（瀋陽），第 3 期（2006 年），頁 49。
- 周雪光，「『逆向軟預算約束』：一個政府行為的組織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北京），第 2 期（2005 年），頁 132~207。
- 周湘斌，「我國社會轉型時期農民群體的社會權利與政策性排斥」，*北京科技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北京),第20卷第3期(2004年9月),頁15。
- 孟秋菊,「我國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倫理建設探析」,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 孟軻、王玉福,「試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危機意識」,唯實(南京),第7期(2005年),頁11。
-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北京),第5期(1999年),頁39~40。
- 段文娟,「論『社會排斥』與農村『新貧困』」,重慶工商大學學報(重慶),第15卷第6期(2005年12月),頁12。
- 段麗萍譯,Joseph E. Stiglitz 著,「後華盛頓共識(下)」,國外社會科學文摘(上海),第2期(1999年),頁19。
- 洪朝輝,「論中國城市社會權利的貧困」,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2期(2003年),頁116~125。
- 洪朝輝,「論社會權利的『貧困』—中國城市貧困的根源與治理路徑」,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第4期(2002年),<http://www.cgarden.net/StubArticle.asp?issue=020402&total=79>。
- 胡鞍鋼,中國:新發展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 胡錦濤,「發揚井岡山精神 全面建設小康」,新華網,2003年9月2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2003/Sep/396482.htm>。
- 胡錦濤,「領導幹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中新網,2008年3月31日瀏覽,<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02-18/26/273898.html>。
- 胡錦濤,「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中新網,2008年3月31日瀏覽,http://news.yninfo.com/china/gsyw/200710/t20071009_484378.htm。
- 范燕寧,「當前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研究綜述」,哲學動態(北京),第1期(1997年),頁18。
- 唐鈞,「社會政策的基本目標:從克服貧困到消除社會排斥」,江蘇社會科學(南京),第3期(2002年),頁42~43。
- 唐鈞,中國城市居民貧困線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 孫立平,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 孫立平,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徐俊忠,「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走出『市場崇拜』的誤區」,現代哲學(廣州),第1期(2007年),頁10~12。
- 徐勇,「從新權威主義到新民本主義—中國改革發展的路向及轉變」,決策諮詢(合肥),第9期(2003年),頁38~39。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馬廣海,「處於社會排斥中的弱勢群體」,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青島),

第4期(2004年),頁171。

馬曉河等,「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若干問題的研究(主報告)」,《經濟研究參考(北京)》,第50期(2006年),頁2~27。

崔光勝,「論西方公共行政精神的嬗變」,《湖北行政學院學報(武漢)》,第5期(2007年),頁21~24。

常素梅,「重塑合法性基礎—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建設面臨問題的思考」,《常熟高專學報(常熟)》,第1期(2004年1月),頁1~4。

張天蔚,「從若干『新提法』展望中國的未來」,《人民網》,2007年10月22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6411726.html>。

張再林,「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對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啓示」,《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第24卷第3期(2004年9月),頁41~42、52。

張良、戴揚,「經濟轉型理論研究綜述」,《開放導報(深圳)》,第6期(2006年),頁93~96。

張忠友,「公共服務型政府探析」,《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太原)》,第30卷第5期(2007年10月),頁95。

張茱楠,「創新之源—新經濟時代人類個性復興的探究」,《現代管理科學(南京)》,第1期(2005年),頁53~54。

張萬鐸,「人本論的經濟發展觀」,《貴州社會科學(貴陽)》,第5期(2004年9月),頁59。

張夢中譯, Terry Komm & Marc Holzer 著,「新公共行政:尋求社會公平與民主價值」,《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2期(2001年),頁43~46。

張潔琄、陳國權,「政府與市場:建構新型的夥伴關係—斯蒂格利茨經濟學說中的政府理論評析」,《新視野(北京)》,第2期(2000年),頁36~38。

張學森,「科學發展觀:背景、內涵及創新點」,《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學報(成都)》,第2期(2004年),頁25~26。

梁瑩,「治理視角下我國政府改革的新思維」,《理論與改革(成都)》,第2期(2003年),頁48。

陳一放,「論當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社會科學研究(北京)》,第3期(1998年),頁42~43。

陳向義,「傳統發展觀的前提批判」,《社會科學(上海)》,第4期(2003年),頁87~90。

陳惠雄,「人本經濟學的重要理論觀點」,《財經論叢(杭州)》,第3期(2004年5月),頁68~73。

陳惠雄,「追索經濟真的心路歷程—《人本經濟學原理》述要」,《管理世界(北京)》,第8期(2004年),頁153。

陳惠雄,「經濟與人本:關於科學發展觀的兩個基礎理論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杭州),第35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46。

- 陳雲芝，「論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6年）。
- 陳德昇，**兩岸危機管理：SARS的經驗教訓與比較**（台北：晶典文化，2005年）。
- 傅丕毅等，「流動人口：政治邊緣人」，**浙江人大**（杭州），第5期（2005年），頁16~19。
- 單少杰，「中國改革的整體性視角－從一種『新發展觀』談起」，**哲學研究**（北京），第11期（1994年），頁3~11。
- 景曉芬，「『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綜述」，**甘肅理論學刊**（蘭州），第2期（2004年3月），頁20~24。
- 黃孝如譯，Joseph E. Stiglitz 著，**世界的另一種可能**（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7年）。
- 黃明哲，「關於提升中國共產黨執政競爭力思考」，**理論前沿**（北京），第15期（2005年），頁16~18。
- 黃馨慧譯，賽吉·高德里耶主編，**全球新趨勢**（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
- 廖小軍，**中國失地農民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 漆燕譯，鮑勃·杰索普（Bob Jessop）著，「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濟發展為例的論述」，**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北京），第1期（1999年），頁31~48。
- 劉志彪、丁棟虹，「人本主義導向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唯實**（南京），第4期（1999年），頁16~21。
- 劉華珍、雷洪，「失地農民的社會權利貧困」，**經濟與社會發展**（南寧），第4卷第2期（2006年2月），頁158~160。
- 劉熙瑞，「服務型政府：本質及其理論基礎」，**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北京），第5期（2004年），頁25。
- 劉熙瑞，「服務型政府－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選擇」，**中國行政管理**（北京），第7期（2002年），頁5。
- 潘岳，「踐行科學發展觀要義之一是推進建設生態文明」，**新華網**，2008年3月31日瀏覽，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5/content_6886498.htm。
- 潘澤泉，「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發展困境與社會風險」，**戰略與管理**（北京），第1期（2004年），頁87。
- 潘澤泉，**社會、主體性與秩序：農民工研究的空間轉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 諸大建、胡聖譯，Herman Daly 著，**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
- 盧映川，「論新發展觀」，**首都經濟**（北京），（2002年12月），頁18~21。
- 遲福林，「論『公共服務型政府』」，**理論參考**（福州），第6期（2006年），頁26~27。
- 錢志鴻、黃大志，「城市貧困、社會排斥和社會極化－當代西方城市貧困研究綜述」，

- 國外社會科學 (北京), 第 1 期 (2004 年), 頁 54~60。
- 羅榮渠主編, 現代化: 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3 年)。
- 譯者不詳, Joseph E. Stiglitz 著, 「新發展模式」, 中國發展觀察 (北京), 第 4 期 (2007 年), 頁 56。
- 譯者不詳, Joseph E. Stiglitz 著, 「中國已經趟過河流」, 價格理論與實踐 (北京), 第 7 期 (2007 年), 頁 70。
- Chang, Gordon G., (章家敦),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London: Arrow, 2002)。
- Daly, Herman, *Steady-State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with New Essay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1)。
- Dorsner, Claire, "Social Exclu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38, no. 4, (2004), pp.366~382.
- Lieberthal, Kenneth G.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Percy-smith, Janie,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erroux, François,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Tenets* (London & Canberra: Croomhelm, 1983)。
- Sahlins, Marshall,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ress, 1972)。
- Sen, Amarty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 Silver, Hilary,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5/6 (1994), pp. 531~578.
- Stiglitz, Joseph J.,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s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resented as the WIDER Annual Lecture, at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 Helsinki, 1998, <http://www.wider.unu.edu/events/annuel1998.htm>.
- Strobel, P., "From Poverty to Exclusion: A Wage-Earning Society to a Society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148 (1996), pp. 173~189.
- Wolf Jr., Charles, *Markets or Governmen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0)。